

近代租界类城市的复杂影响

撰文/熊月之

租界类城市

鸦片战争以后，西方殖民主义者凭借坚船利炮，利用清朝统治者在外交方面的颛顼无知，在许多通商口岸设立租界。

近代中国先后共设立过27个租界。其中公共租界两个，即上海公共租界与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；专管租界25

个，即上海3个（英、美、法），汉口5个（英、德、俄、法、日），广州2个（英、法），天津9个（英、法、美、德、日、俄、比、意、奥），厦门、镇江、九江各1个英租界，杭州、苏州、重庆各1个日租界。上海英、美租界在1863年合并为上海公共租界，天津美租界在1902年并入英租界。

这些租界中，上海英租界设立最早，设于1845年，其后设立的有上海法



20世纪上半叶上海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

租界、美租界。在全国范围内,除上海租界之外,较早设立的是天津英租界、法租界,广州英租界、法租界,汉口英租界,九江英租界,镇江英租界,它们都是1861年才设立的。

这些租界中,上海租界规模最大。上海英、法租界最初设立时,面积都不超过千亩,美租界则连四至也没有划定。以后,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都通过各种手段扩张范围,到1899年公共租界面积达33503亩,1914年法租界面积达15150亩。上海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总面积最大时达48653亩,这在全国租界中,无出其右。天津、汉口、广州等其他24个租界的总面积之和最大时才30612.32亩。也就是说,上海两租界面积之和是中国其他租界面积总和的1.5倍以上。

这些租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收回一批,主要是德、奥租界;1927年北伐战争以后又被收回一批,包括汉口英租界、九江英租界、镇江英租界、厦门英租界;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部被收回。

近代中国还有一些类似于租界的地区。

其一是租借地,如胶州湾租借地、旅大租借地、威海卫租借地、广州湾租借地。各租借地租借年限有所不同,其行政长官多由租借国政府任命,司法权

多被租借国所攫取。

其二是避暑地,如庐山避暑地、北戴河避暑地、莫干山避暑地、鸡公山避暑地。外国人在这些地方仿行租界制度,有由外国人组成的地方自治机构,有相当于租界工部局董事会的行政领导机构。这样的地方其功能主要是避暑,而不是通商,设施亦多与避暑有关。

其三是外国人居留区,如宁波外国人居留区、福州外国人居留区、营口英人居留区、烟台外国人居留区。在这些居留区,外国人在市政管理等方面攫取了部分权力,中国政府也还拥有一部分管理权力,如对华人的管辖权。所以,这些居留区还不是租界,算不上国中之国。

其四是贸易圈,是俄国人在中国西北地区开辟的居留、贸易区域,如塔尔巴哈台贸易圈、伊犁贸易圈。其地管理方式与租界类似,只是土地不是租来的,而是清政府无偿指拨的旷地。

其五是铁路附属地。19世纪末,俄国在中国东北兴建中东铁路,在哈尔滨、海拉尔、满洲里、奉天、营口等地开辟铁路附属地,在上面建筑车站、停车场,以及供职工和其他商民居住的市街,并攫取了其地的司法、警察、课税等主权。20世纪初日俄战争以后,日本战胜俄国,继承了该路的南满部分,扩

展了铁路附属地。

如果将租界、租借地、避暑地、居留地、贸易圈与铁路附属地连带一起考虑,那么,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,就有为数可观的城市或景点呈现异样的色彩。如果从北向南数起,它们依次是满洲里、海拉尔、哈尔滨、奉天、营口、大连、天津、烟台、威海卫、青岛、上海、宁波、福州、厦门、广州;如果沿着长江从东向西数起,则有上海、镇江、芜湖、九江、汉口、重庆。此外,中俄边境上有塔尔巴哈台与伊犁,风景名胜区内有庐山、北戴河、莫干山与鸡公山。这些涂抹着异域色彩、飘散着外洋气息的城市与景点,是在外力入侵以后、西方文化影响之下发展或兴建起来的,是在中国传统城市体系之外出现的另一类城市与景点。

这类城市,没有共名,我暂且名之曰“租界类城市”。

租界类城市有以下一些共同特点:一,居住过数量可观的外国人,上海租界外国人最多时超过十五万;二,建立过不同于中国行政系统的管理机构,如工部局、公董局,实行过与中国不同的制度;三,建有外国风格的建筑(住宅、教堂、医院、学校),有一些与中国一般城市不同的风俗习惯;四,与外国有着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。这类城市在近现代中国影响极其广泛、深刻、复杂。下

面以租界为主,兼及其他城市,对其影响作一简介。

“国中之国”

租界类城市都建立过不同于中国行政系统的管理机构,实行过与中国不同的管理制度。

租界的制度建设,一般有六大支柱,即纳税人会议、工部局(或公董局)、巡捕、领事公堂、会审公廨与万国商团。这些制度建设,各个城市或有不同,但大同小异,以上海租界最为完备。

其一,纳税人会议。最早建立纳税人会议的是上海英租界,其前身是道路码头委员会。起初的道路码头委员会三人组成,负责租界内道路和码头建设事务,1854年以后扩大转变为纳税人会议,成为租界内的“立法”机构,负责修改土地章程、税率调整、市政道路建设、社会和文化管理以及华人参政等各项议决,实施对工部局的行政监督。与英租界相类似,法租界也设有纳税人会议。

其二,工部局。上海英租界在1854年华洋杂处以后,正式成立工部局作为管理机构。工部局是租界市政组织和领导机构,由纳税人会议选董事,再由董事选举总董;下设财务委员

会、警备委员会、工务委员会、铨叙委员会、公用委员会、卫生委员会、交通委员会、音乐委员会、图书委员会等，还直辖万国商团、警务处、火政处、公共卫生处、工务处、教育处等办事机构。上海法租界也有类似机构，名公董局。

其三，巡捕。英租界设立之初，仅设更夫，1854年以后开始正式设立巡捕，即武装警察。工部局建立了巡捕房，并制定服务规则，其管辖范围相当广泛，除了警务，还有道路的整洁与燃灯，有碍公众的事物的取缔以及搜查军器的输入和解除华人武装，协助征税，筑路，都在其内。

其四，领事公堂。这是领事行使治外法权的机构，英、美、法等国在上海均有设立。英国在沪领事法庭成立于1847年，后改为英国在华高等法院。1848年，美国在上海设立领事法庭。1920年，美国在沪领事法庭的法官由美国司法委员会委派的司法委员担任，改称美国司法委员法院。法国于1849年在上海设立领事法庭，以驻沪领事为庭长。俄国、普鲁士、奥匈帝国、丹麦、荷兰、西班牙、比利时、意大利、葡萄牙与日本，总计有13个国家根据其本国制订的“领事法规”或“海外裁判法规”在上海设立过领事法庭，受理本国侨民（包括其“保护国”侨民）为被告的诉

讼案件。

其五，会审公廨。这是中国政府设在英美租界最早的司法机构，1864年设立。由道台派出的两名低级官员和若干名领事组成，初仅审理涉洋华人轻微民、刑事案件和违警案件，后来发展为会审公廨。按照规定，涉洋案件均须由有关外国领事会一同审理，此即“会审”一词含义，其上诉机关为道台与有关领事。后来在外国陪审官的挟持下，公堂管辖范围扩大，判决亦概以陪审官意旨为准。其提、传人犯及关押犯人等事务，则尽为工部局控制。辛亥革命期间，上海领事团借口献员挟款逃匿，擅自接管公堂，自行委任献员，并扩大会审范围，取消上诉程序。“五卅”运动后始慑于中国人民的压力，于1926年交还公堂，改为临时法院。法租界亦设有会审公廨，性质类似。

其六，万国商团。原称上海地方义勇队，为上海公共租界建立的准军事化组织。1853年建立，职能是协助各国驻军一起防卫租界。后来规模不断扩大，至1870年已辖有甲、乙、上海轻骑和上海重炮四队，改归工部局管辖，成为工部局常设机构，工部局总董为其最高统帅。1900年后，万国商团陆续吸收别国侨民和华人组织的义勇队参加，先后编入日本、美国、葡萄牙、中华、上海苏格兰、德国、奥地利、菲律宾、海关

等队。1927年后万国商团又雇佣白俄人，建立常备性质的白俄第一、第二、第四队，还新建了装甲车、通信、运输、防空、译员等特种兵队。这是工部局重要的武力支柱，曾经多次镇压租界内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。1941年12月日军占领租界，次年6月被日方控制的工部局解散。

这六项制度，基本上将西方的立法、行政、司法体制移植进来，会审公廨与万国商团，则是结合租界社会实际情况而设立的特别制度。当然，移植过程中有很大变异，比如所谓纳税人会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华人完全排斥在外，华人纳税但毫无权力，只是到了后期，在华人的强烈抗议与要求下，才点缀性地增加了一点华人董事的名额。

这些制度在上海租界建立较早，后来被移植到汉口租界、天津租界、广州租界等处。天津英租界设有纳税人会议、工部局、巡捕，但没有会审公廨。德租界、奥租界、俄租界、比租界均设有工部局。汉口的英租界、法租界、德租界等也设有纳税人会议、工部局、巡捕房等机构。

德国人在青岛租借地实行的是总督负责制。总督由德国远东舰队的海军司令充任，受海军部管辖，直接听命于德皇，其地位与待遇相当于德国在

非洲、澳洲的殖民地总督。总督公署之下，设置“四部一会”，即军政部、民政部、经理部（负责财政）、工务部和参事会。民政部下面有警察局、埠头局、港务局、地理局、户籍局、山林局、鸦片局、华人政务局等。参事会为总督的咨询机关。司法方面，德国当局在青岛设立了初等裁判与高等裁判，并设置陪审员。1900年，德国当局在青岛设置巡捕局，统辖各处捕房。胶澳租借地实际上已成为德国殖民地。

示范效应

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文明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，曾经长期站在世界文明的前列，16世纪以后，由于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，在世界上落伍了。相形之下，欧美等国自工业革命以后，走到了世界文明的前列，特别是物质文明方面。鸦片战争以后，中西会面，中国是被侵略的一方，同时又是文化落后的一方。租界类城市地处中西文化交接的前沿，既是反对外国侵略的前线，也是了解、接纳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窗口。

体现西方科学技术的各类机器、各种设施，宽敞的马路、明亮的橱窗，电灯、煤气、自来水、电话、电报、自鸣钟、洒水车，花园洋房等等，都是西方



1910年代的外滩

科学技术的载体；纳税人制度、司法制度、选举制度、交通管理制度、卫生管理制度、罚款制度、户籍制度，都是西方制度文化的载体；赛马、赛船、体育竞技、杂技、戏剧、舞会以及西人的种种行为方式，都成了体现西人精神风貌的行为。西人设在大陆的第一家西医医院是广州新豆栏医局，第一批有关西医的书籍是传教士合信在广州与上海相继出版的《全体新论》等，第一份中文杂志是1833年在广州创办的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》，第一份专门的科学杂志是1876年在上海创办的《格致汇编》，第一所近代天文台是1872年在上海建立的徐家汇天文台，第一家公园是1868年开放的上海外滩公园……这方

面，难计其数，不胜枚举。

租界类城市在一定范围内、一定程度上，是西方人管理的世界。西方人将欧美的物质文明、市政管理、议会制度、生活方式、伦理道德、价值观念、审美情趣都带到这里，使这里变成东方文化世界中的一块西方文化“飞地”。最显而易见的是市政建设。以上海租界为例：1860年代开始使用煤气路灯照明，兴建道路排水工程，在道路两侧种植行道树；1861年创设人行道，实行人车分道；从1864年起建造公共厕所；1869年开始规定道路保护规则，如果有人擅自取去、私行改动铺砌之砖石等，即行照罚；同年开始禁止在公共道路上堆放杂物；1872年开始实行行车

靠边原则；1870年代初开始，工部局在界内主要街道实行洒水制度；1874年开始规定倾倒垃圾时间必须在早上九点以前倒在路旁，否则罚款；1897年开始添置垃圾桶。在天津、青岛等地也有类似的管理措施。

清末民初，内地城市普遍掀起地方自治高潮，开始注意加强城市管理，其主要内容即取自租界。租界或居留地城市展示、体现的西方文化，可以毫无遮拦地扩散开来，并且与华界产生巨大差距，极大地刺激着华人社会，推动着中国学习西方的步伐。上海、天津等绅商设立的煤气公司、电力公司、马路工程局，发起的地方自治运动、华人参政运动，日趋健全的市民意识、法制意识、公共秩序意识，这些都与租界的示范效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曾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见到先进的沙面租界的市政建设，感慨地说：“省河北岸自洋人修筑沙基，地势增高，堤基巩固，马路宽广，而我与毗连之处街市逼窄，屋宇参差，瓦砾杂投，芜秽堆积，不特相形见绌、商务受亏。”因此，他在省河北岸修筑长堤和天字码头。1918年至1920年，广州大兴土木，进行市政现代化建设，铺设石街、兴筑马路、开辟公园，这些也与沙面租界的刺激有关。在同一城市中，租界在物质文明、制度文明、精神文明诸方面，往

往成为华界的示范。在全国范围内，这些租界类城市往往又成为内地其他城市的示范。

缝隙效应

租界类城市在一定范围、一定程度上既是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，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但又居住着大批中国居民，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但又与中国政府管辖的区域仅有一河之隔、一桥之隔或一路之隔，这些特点，使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一道缝隙。

缝隙，意味着安全系数较高。在战乱时代，安全比什么都重要。因此，这道缝隙虽然很小，但影响很大。这道缝隙在清朝政府、北洋政府、南京政府的统治系统中，成为一条力量薄弱的灰色地带，形成持不同政见者或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。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，慈禧太后钦命捉拿要犯康有为，康有为在上海租界的保护下得以脱逃。1900年，持不同政见者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愚园召开“中国国会”公开反对慈禧太后。1903年，章太炎、邹容等人在《苏报》上发表鼓吹反清革命的文章，轰动一时，清政府千方百计与租界当局联系，将章太炎等拘捕，本欲将他们引渡严惩，但是，由于租界的存在，

最后章、邹仅被轻判三年与两年的监禁。清末于右任等在上海办的鼓吹革命的报纸《民呼日报》、《民吁日报》，如变戏法般禁而不绝，都是利用了这道缝隙。

民国初年，一大批前清重臣变成遗老，抵制新成立的民国政府，躲进上海租界、天津租界与青岛居留地。流寓上海租界的遗老有：盛宣怀，官至天津海关道、会办商约大臣、邮传部大臣等；瞿鸿禨，官至工部尚书、军机大臣、外务部尚书；沈曾植，历任刑部主事、总理衙门章京、安徽提学使、署安徽布政使等；陈夔龙，官至漕运总督、湖广总督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；瑞澂，历任上海道、江西按察使、江苏巡抚、湖广总督。流寓天津租界做遗老的有：张曾敫，曾任广西布政使、山西巡抚、浙江巡抚等，他在浙江巡抚任上，曾下令杀害秋瑾；荣庆，官至军机大臣、学部尚书；张彪，官至湖北提督；铁良，官至军机大臣、陆军部尚书、江宁将军。流寓青岛的遗老有：吴郁生，吏部、邮传部左侍郎；周馥，署直隶总督、山东巡抚、两广总督；张人骏，山东布政使、两广总督、两江总督；赵尔巽，湖广总督、东三省总督；李经羲，福建布政使、云贵总督。这些人不但保住了性命，而且可以拖着长辫子在上海、天津、青岛城市里悠哉游哉。民国年间，

逊帝溥仪、前清庆亲王载振都在1925年躲进天津日租界，袁世凯、黎元洪、徐世昌、冯国璋、曹锟等五位大总统在天津有住宅，段祺瑞、唐绍仪等九位总理也在天津租界里置有住宅，他们都是看中这里的安全因素，都是利用了这道缝隙。

孤岛效应

从地理上说，上海、天津、青岛等地都不是岛屿，但从政治空间上说，因为有租界的存在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确是一个孤岛。清朝政府、北洋政府、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号令，可以行至天涯海角，在上海、天津租界、青岛居留地却不能畅行无阻。中国其他地方硝烟滚滚、哀鸿遍野，这里却可能风平浪静、灯红酒绿。在太平天国、中法战争、八国联军侵略中国、日俄战争、辛亥革命、江浙战争、北伐战争以及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期，上海租界都处于中立状态，烽烟不起，锋镝不鸣。近代中国是在连绵不断的外侵、内乱、天灾、人祸中走过来的，上海、天津等相对稳定安全的孤岛，意义就特别重要。它对上海、天津等地的经济、社会特别是人口的发展，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。大批官员、富商来这里居住、置业，各种人才向这里涌来，无数游资向这

里集中。严复、郑孝胥、陈夔龙、岑春煊、段祺瑞等一大批官僚，其事业基地并不在上海，或不主要在上海，但是，他们看中上海租界这片安全的孤岛，将家小安排在这里，将资金投放在这里。抗日战争前，广州政局动荡，广州有钱人家纷纷把金银珠宝、字画古董等存放在沙面的外资银行。富人重视安全，穷人也重视安全。每遇战乱，总有大批人涌入租界。上海人口从开埠初期的二十多万，到1949年增长到五百多万，绝大多数都是在外侵、内乱、天灾、人祸时涌入上海的。天津、青岛人口的增加，很大部分也是在战乱时期。

集散效应

租界类城市都是移民城市，人口来自全国各地，尤以上海为甚。这里的外商机构来自世界各地，其中的国商机构也与世界各地发生广泛联系，于是，发生在这些城市的事情往往与全国、全世界紧密相连，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在这里也特别敏感，这使得它成为全国全世界各种信息的集散地，各种经济、社会、政治力量的关注点，发生在这里的事情也会有放大效应。拒俄运动、抵制美货运动、“五四”运动期间，上海工人、商人、学生的活动、“五卅”运动

之所以影响那么巨大，与上海城市集散效应有密切关系。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，上海的福建人、广东人特别积极，除了爱国情感，还有爱乡情感，寓居美国的华侨大半来自这两个省份。

“五四”运动时期，上海市民中参加爱国运动最积极的是上海的山东人，因为山东的问题与他们息息相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等地方政府官员面对群情激奋的上海学生、商人，态度相当克制，没有与群众发生激烈冲突，甚至代向北京政府转达罢免曹、章、陆的民意。其背后的原因，很重要的一条：卢永祥是山东人，对因山东问题而起的民众爱国运动，内心深处比较复杂。

租界类城市的集散效应还突出地表现在经济生活中。这些城市近代化程度较高，在技术引进、产业转换、经济制度建设方面，往往起步较早，在进口与转运外货、吸纳与输出土货、吸收与转移技术、培养与输送人才方面，起着蓄水池、培训地或中转站的作用，成为联系外洋与内地的枢纽。一些著名的企业、企业家与本乡本土的联系都远比他处更为密切，虞洽卿与宁波，张謇与南通，荣家企业与无锡，先施、永安等四大公司与广东，都是非常突出的例证。■

（作者单位：上海社会科学院）